



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

黎锦熙传略

白吉庵



黎锦熙字劭西，湖南省湘潭县人，生于1890年2月2日（清光绪十六年正月十三日）。其父黎培奎为乡里“名士”，擅篆刻，诗画、曾与齐白石等合组“龙山诗社”。黎锦熙自幼喜爱书文，4岁时，其父迎塾师王仲言为之“启蒙”。9岁时阅读《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眼界为之开阔。11岁读完《十三经》。12岁开始写日记，一直坚持到病逝前。16岁应县试、入学为秀才。

1906年受湘赣萍浏醴起义的影响，在长沙与张平子发起“德育会”，以王阳明的“致良知”为宗旨，鼓吹“牺牲个人，努力救国”。有一次开会，被清政府侦悉，遂逃匿回乡。次年，在实业救国思潮的鼓舞下，他考入北京铁道专科学堂学习。不久，学校因遭大火而停办，全部学生转入武昌湖北铁道学堂。后，黎以秀才的资格考入湖南优级师范史地部。1911年夏毕业，成绩为全校第一。

辛亥革命后，湖南成立军政府，其师颜昌峣接办《长沙日报》，他被聘为主编。因鼓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被迫停刊。

之后，他与朱让耕、任凯南等创办《湖南公报》，1912年4月3日创刊。他为该报踊跃写稿，几乎每日撰社论一篇，时评一则。

次年，黎应湖南省立编译局之聘，负责编辑小学教科书。他敢于冲破封建思想的藩篱，把《西游记》里的章节选为课文。这在当时是“异端”行为，轰动了教育界。接着他出版了《教育学讲义》，提倡教育要普及到民众中去。同年，他任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历史教员。当时，毛泽东同志在该校预科班学习，师生之间常有信件来往。解放后，他将多年保存下来的六封延安来信，献给中央档案馆，表明了他对党的崇敬心情。

1914年，“四师”与“一师”合并，改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他与同事杨怀中，徐特立等创办“宏文图书编译社”，介绍欧美新书，编辑中小学教材。同时创办《公言》杂志，宗旨是主持公正，议论国事。仅出了两期，被迫停刊。后来他们又在李氏芋园办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杨怀中为指导，经常讨论一些哲学问题。学生中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也常来参加他们的讨论活动。

1915年9月，黎锦熙入京任教育部编纂处编纂员。黎锦熙与陈懋治等人，认为当时最紧迫的问题是文字问题。因此，分头写文章，鼓吹改革文字，提出“言文一致”（即普及白话文）和“国语统一”（即推广普通话），并要求教育部下令改国文读本为国语读本，一切从小学做起。

由于他们的努力，1916年10月在北京成立了“国语研究会”，次年开第一次大会，举蔡元培为会长，黎为委员之一。该会宗旨是研究本国语言，选定标准，供教育界采用。钱玄同也参加了这个组织。黎和钱在国语运动中并肩战斗，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1918年由于黎锦熙、吴稚晖等人四处奔走，教育部终于公布了1913年“读音统一会”议定的“注音字母”。这是一件大事。从此国语运动出现了一个新局面。黎为此创制了注音符号草体，

并亲自到各地去宣讲。同年10月到武昌，次年1月到太原、并调查了当地的运动情况。后来他将这两次外出的讲稿汇集成《国语学讲义》，同年五月公开出版。

“五四”运动爆发后，“国语研究会”会员由一千余人猛增到九千八百余人。黎锦熙等人认为应当在教育部内设一机构来加强领导，于是成立了“国语统一筹备会”。黎为部派会员兼国语传习所导师。同年出版了他参与审订，由吴稚晖按1913年通过的国音标准编撰的《国音字典》。他们企图以此来统一全国的读音。但是南京高师的张士一等人提出异议，主张“国音”当以北京音为标准，于是引起了“京国问题”之争。为此，黎锦熙奉命到江、浙等地去调查，并在南京约集两派开会讨论。会上双方争议，互不相让。黎从中调和，但无济于事。后来他发表一篇《统一国语中“八十分之一”的小问题》的文章，说明两派国音标准基本相同，差异很小，如：陆、六、绿三字，京音派主张按北京音分三个音来读；国音派照顾到全国现状，只读一个“lù”音等。所以，他认为争论的问题，只有八十分之一，是个小数。他希望大家在实践中还是不变更原来决议为好，但学理上的辩论还是可以进行。问题没有真正解决。他返回北京后，与钱玄同商议，决定在不变更的原则下，又作了一些修订。次年，由教育部公布，作为全国文字读音标准。

1920年，黎锦熙受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师大前身）之聘，到该校国文系任教，讲授“国语文法”。当时他开这门课的目的，是要回答“国粹派”攻击他们有新文学而没有新文法等议论。同时，他想以此来促进国语运动的发展。他曾说过：要推行国语运动就不得不讲“语法”，说话对不对，下笔通不通，都是跟“语法”有直接关系。因此，他认为“国语”的范围，除语音已推行注音字母外，还应着手语法和词类两方面的工作。当时他广泛收集“五四”以来大量涌现出来的新文学的语言资料，结合

口语，进行深入研究，归纳出一些公式和规则，证明白话文是有法可循的。后来经过反复教学实践，丰富内容，整理成册，于1924年出版了《新著国语文法》。这是我国第一部白话文的语法专著。在这部书里，他吸收了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创立了句本位的语法体系。其特点是以句法为纲，词类为目。所谓纲举目张，问题即可迎刃而解。之前，中国研究语言的学者，一向不重视语法，到了“马氏文通”，才比较系统地讲了一点语法，但多是词法，句法谈得很少。黎第一次把句法提到主要地位，这是一个突破。其次，他应用图解法来分析句子，使词的主从关系明确，职能和功用一目了然，这在教学上有一定的价值，但不易掌握，有人认为过于繁琐。是书出版，有助于我国现代汉语语法学的研究，后来再版24次之多，足见其影响之大。

1923年，黎锦熙与钱玄同、赵元任、刘复、汪怡、林语堂等11人，受“国语会”之委派，组织“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研制国语罗马字，准备将来进行文字改革。后来人员分散，只剩在京的六位委员常聚在一起商讨，自称“数人会”。同年，他们为《国语月刊》编辑了《汉字改革》专号，大力宣传以罗马字（拉丁字）代替汉字。当时黎发表了《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道》，强调了词类连写对汉语拼音文字的重要意义，因为汉语同音异义词太多，如果按文法的条理，使它连结为复合词多音词，解决中国人最不习惯的拼音制问题。

这时，黎锦熙认为“语音”与“语法”已有了初步解决，现在“词类”一项当提到日程上来了，于是他开始这方面的工作。因为词义有古今之分，方言有异地之别，所以得从许多词中选一个最普通，且是大家认为比较标准的词，作为代表，这就需要编一部《国语词典》，来解决这问题。于是他建议在“国语会”下，设“国语词典编纂处”负责这项工作。不久该会成立。后因经费缺乏，人员星散，只收集了一部分资料，工作就停顿下来了。

1925年，文言文和白话文之争，十分激烈。章士钊以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身分，提出复古读经的主张，并在《甲寅》杂志上，大肆攻击白话文运动。当时，黎在教育部任职，是章之部属，但他敢于犯上，决不附和。一次，开部务会议讨论小学生读经问题，他力争不胜，会后向章递一呈文，痛陈读经之弊，谓“有百害而无一利”云云^①。这时，他与钱玄同办了一个《国语周刊》与“甲寅派”展开辩论。在征文启事中，公开提出“欢迎投稿，不取文言”的告白。后来在“女师大”的学潮中，他虽是该校国文系的代理主任，但仍坚决地与鲁迅站在一起，支持学生驱逐反动校长杨荫榆的斗争。

1926年1月，国语运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开幕时，他作了一篇宣言，指出今后的方针是“国语统一”和“国语普及”两件大事。他鼓励与会者埋头苦干，继续前进，目的是会达到的，最后作了一首寓意深刻的“龟德颂”，以“任重能背，道远不退，快快儿的慢慢走，不睡！”等诗句来勉励大家。

同年9月“国语罗马字研究委员会”在北京开会，会上通过了黎锦熙、赵元任等人提出的汉字改革方案（即数人会研制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并决定送教育部批示，但未获批准。他们便利用“国语统一筹备会”的名义，自行发表。

就在这年，他编撰的《国语四千年来变化潮流图》在美国费城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上展出，获得奖章、奖状。此图将我国语言文学发展的源流，用图解法勾画出来，来龙去脉十分清楚，西方人士看后，对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赞叹不已。

1928年，北洋政府垮台，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时蔡元培任大学院（即教育部）院长，欲谋国语统一，特聘黎锦熙、钱玄同为“国语统一会”的筹备员，接着公布了未获北洋政府教育部批准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从此，国语罗马字正式诞生了。这在中国汉字改革运动史上是一次飞跃。

同年，黎被聘为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院长。他提议编一部“大辞典”，以此推动国语运动向前发展。他说：“要对中国文字作一番根本的大改革，因而不能不给四千年来的语言文字和它所表现的一切文化学术，结算一个详密的总帐，以资保障而便因革”^②。在他的倡导下，“国语统一筹备会”将过去的“词典编纂处”扩大，成立了“中国大辞典编纂处”，设在中南海居仁堂西四所，以黎为总编纂（负责词义之审订）；以钱玄同为总编纂（负责字形、字音之审订）。下设搜集、调查、整理、纂著、统计等五部。预计找出每个词的变化规律，从字形、字音、字义三方面推知语源，说明流变，以便为将来推行新文字扫除障碍。计划出书十巨册、30卷，20年完成。然而，情况不断变化，就在这年秋天，大学院改为教育部，蒋梦麟任部长。由于国语运动声势浩大，引起保守派的不安，蒋上任后，采取限制办法，将“国语统一会”改名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缩小机构职权，使国语运动遇到了重重的困难。但黎锦熙等人并不气馁，仍坚守阵地，不懈地工作。他说：“现在是准备时期，只有一条路，多出读物，将来到实行期，那自然有办法的。”^③这些话，表现了他不畏险阻的“龟德”精神。后来形势发展越来越不利，到1930年，国民党政府公然接受保守派的建议，采取强制措施，通过法令，将“注音字母”改为“注音符号”。他们把文字改革视如洪水猛兽，必欲取缔之而后快。经过这次以后，黎锦熙等人原想用注音“字母”来拼写外来语、减少汉字的愿望，不能实现了，于是“注音符号”成为改良后的反切、没有起到预计的作用。由此可见，他们想依靠国民党政府来改革汉字，事实证明是行不通的。

1931年北平男女两师院合并为北平师范大学，照章成立文学院，黎被聘为该校文学院院长。这时，为了宣传和总结四十年来国语运动的经验，他写了《国语运动史纲》（1934年出版）。这部书详细记录了自清末以来的汉字改革、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及

大众语等运动之始末，其中引用了大量的文件，这对研究文字改革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此外，“大辞典编纂处”的工作，因国民党政府不积极支持，经费无着落等原因，原订计划，难以实现。他们艰苦挣扎，收集了三百多万张卡片，写了不少论著。据1934年统计，共有296种，约600卷。黎所撰写的《审音通说》、《论“将”》、《说“把”》等论文，及《国语运动史纲》、《比较文法》等专著，都是利用该处资料写成的。当时参加这项工作，除黎、钱二位总编外，还有刘复、魏建功、白涤洲、孙楷第等人。后来他们为了满足实际的需要，先后编了一些中小型字典：如1932年出版的《国音字典》，1937年出版的《国语辞典》等等。

1934年上海方面的语文工作者，将瞿秋白等同志在苏联研制的拉丁化新文字介绍到国内来，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黎发表了评论文章，认为拉丁化新文字派是用方言来破坏国语统一，甚至认为这是外国人代我们作的，等等。这种态度引起学术界的不满，许多人对他进行反驳。后来，这场争论，因外患加深，双方觉悟到有团结起来，建立语文联合战线的必要，于是论战停止，共同对敌。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已深入我国内地，北平已处在日军控制之下。黎锦熙与钱玄同相约，集中精力搞好文字改革和扫盲工作，他们想以此来唤醒民众，一致抗日。为了这个目的，黎认为需要铸一套注音汉字的铜字模，来印刷识字课本和民众读物。

黎在很短时期内，设计了一套字模，与同事汪怡专程赴上海托中华书局研制。返平后，钱玄同选编的简体字谱已告完成，于是他同汪怡又再次南下，携谱出席南京召开的“简体字会议”。讨论了五天，通过1,230余字，最后教育部圈定324个，同年8月公布。但不久，国民党的“中央要人、省主席、名流、都有极力

反对的……”^④，据说当时戴季陶、谭延闿反对尤力。国民党政府训令下属各部：“简体字应暂缓推行”。黎锦熙等人的努力，又遭到官方的抵制。他们感到无可奈何！于是又把精力集中到编纂大辞典上去。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7月下旬，黎应开封、长沙暑期讲习会之约，南下讲学，并负有为“师大”及“大辞典处”物色迁地之使命。时教育部已决定将北平师范大学与北平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合并，组成西北临时大学，迁往西安。他在湘知道这消息后，9月，赴西安归校。当时北方各中学组织服务团到西北，且有数千人将准备入校军训抗日。为了配合形势，黎把法国著名的爱国小说《二渔夫》编入中学课本，鼓励青年抵御外侮。他曾赋云：“攘夷武仗三千虎，建国文凭十八龙。今日山南劳怅望，江湖满地两渔翁。”^⑤其中“三千虎”和“两渔翁”指的就是这两件事。次年春，日军进逼潼关，“西北临大”奉命迁往汉中城固县，改名为西北联合大学，时黎任该校国文系主任。

西北联大迁到城固后，黎很有感慨，他说过去对这些边远省区，只是在讲堂上了解一些，很肤浅，而今身历其境，觉得中国真是地大物博。因此，他认为文化人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要给所在的地方修县志，于是倡议并组织国文系师生，为城固县修地方志，方案由他手定，并总其成。那时，该校历史系也正在从事于汉代张骞墓的发掘工作。并树立《修汉博望侯张公墓碑记》，请黎书写。他在写碑文时，使用了新式标点符号。

1939年1月，钱玄同在北平去世，黎闻讯悲痛不已，写了挽诗四首及《钱玄同传》来悼念老战友。这篇传文有四万多字，记述了钱的生平事迹，也写了当时的国语运动，是研究文字改革的重要史料。

同年8月，国民党教育部将西北联大改为西北大学；师范学院独立为西北师院，迁往兰州，黎任该校教务主任。因交通、住

房等问题，一时解决不了，决定分年迁移，兰州暂定为分院。

1940年7月黎由南郑飞往重庆，出席教育部为恢复国语事而召开的“国语推行委员会”，会上讨论了如何制定方音字母等问题，并成立“全国方音注音字母修订委员会”，负责进行这一工作。会议还推举黎锦熙、卢前、魏建功三委员，按照国音编一部《中华新韵》。是书于1942年出版。

同年，黎锦熙所著《方志今议》出版。在这部书里，他根据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中修地方志的理论，结合实际工作中的经验和体会，论述了新修方志的要旨及其方法。他又利用学校休假的机会调查了关中地区的方言与民俗，并参加了洛川、同官、黄陵、宜川等县的修志工作。

1943年3月，他再次到重庆，出席国语推行委员会与全国方音字母修订委员会，讨论注方音字母的草案，即“全国方音注音字母总表”。当时黎很重视边疆的国语运动，为了扫除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在语言文字上的隔阂，他主张以注音字母为沟通的工具，大量印行“四行课本”，双方文字标出，互注其读音，使边疆少数民族学会注音字母，就可读汉语的书籍了。他的这一设想曾在西北师院试编过，但未能广泛展开。

当时在兰州，学校的生活是比较艰苦的，各方面条件也差，但黎锦熙仍在孜孜不倦地从事于汉字改革工作。有学生却认为搞国语运动，浪费时间，划不来，去请教他。他回答说：人活着要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的幸福，这样人生才有意义。中国文盲多，我们做学术就要从这个角度去考虑，为老百姓做启蒙运动，等等。学生们又问：先生是部聘教授，声望地位都很高，那儿都可去，为什么偏偏要把这块金字招牌挂在这个地方呢？他耐心地答道：这个地方落后，需要人材，而师院是培养人材的，我为什么不把这块招牌挂在这里呢？他的一席话，使学生们深受教益。

1944年10月西北师院最后一次搬迁兰州，黎抱病而行。这

时，黎倡议在兰州西北师院、白沙女子师院、璧山社会教育学院三校，创办国语专修科，培养专门人材，以便将来好开展工作。次年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教育部为了在台湾推行国语运动，设立了“国语推行委员会台湾分会”，由黎锦熙负责选派三校专修科的师生前往工作。“黎门弟子”去台湾省的有一百多人。黎抗战前设计的那套注音汉字铜模，这时也运往台湾，由他的学生梁容若等主持，创办了一个《国语日报》，并出版各种注音读物。

1945年9月，当胜利的消息传到兰州后，西北师院接到了重庆教育部“不得复员，留设兰州”的命令，学生强烈反对。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为了平息学校的怒潮，将院长李蒸调走，委派黎锦熙为院长出来收场。黎只是挂个空名，一切事务由秘书易价去办理。翌年4月他便离开学校到重庆，出席“民主科学社”改名为“九三学社”的成立大会（黎是1945年夏在兰州加入民主科学社的）。他被选为监事，旋即返湘探亲。7月到南京辞去西北师院院长职务，不久由上海飞返北平。这时大辞典处已由西单迁回中南海，改设在怀仁堂东四所，一切事务仍由黎来负责。（该处工作抗战时已基本停顿、后来迁出中南海，由汪怡等人留守。）

1946年10月西北师院师生经过一番斗争，终于回到北平，国民党教育部答应可以设立北平师范学院来接收他们，但不准恢复师范大学的名称。为此又出现了一个恢复校名的斗争。次年7月，黎被“复校委员会”举为代表，与袁敦礼、焦菊隐到南京交涉，但无结果，于是他便应湖南大学借聘一学期之约，任该校国文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并参与湖南省志的编撰工作。

1948年4月他返回北平，继任师院国文系主任，后来师大校名恢复，被聘为该校文学院院长。这次回北平后，胡适请他增补《齐白石年谱》。经过半年多的时间，终于完成了。是书对齐之生平，考证颇多，记叙较详。

就在这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北平，国民党反动派想把一批名教授劫走，给黎送来了飞机票，他毅然拒绝了。

1949年春，北平和平解放，师大成立了校务委员会，他被任为该会主席。6月17日，毛泽东同志亲莅北师大视察，并设宴招待几位老教授。黎出席了宴会。其后，他积极参与各项政治活动，先后被选为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各界代表大会代表；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同年，他与吴玉章同志在师大邀集北京的语文工作者，发起了“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即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前身），10月召开大会时，被选为常务理事、副主席。在这次会议上，他作了长篇讲演，以亲身经历论述了国语运动发展的历史，同时提了许多改革意见。后来题名为《国语新文字论》公开出版。

自北平解放后，大辞典处由中南海迁回西单，作为北师大附属单位。1955年改属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次年并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这期间，为了满足广大群众学习政治和文化的需要，先后由黎主持编写了《学习辞典》、《学文化字典》、《同音字典》、《汉语辞典》等书。

1953年他因患心脏病不能去师大讲课，但仍在家坚持培养青年教师及研究生，并从事文字改革的研究工作。毛泽东同志知道他病的消息后，派人送去许多珍贵药材，并致意慰问。不久，他向毛泽东同志写信，汇报了文字改革的进展情况，而且也提了一些建议。1954年毛泽东回信说：“同意1955年推广注音字母”，体现了党对文字改革的重视和支持。

1957年11月1日，国务院通过公布《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他与吴玉章同志在1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六十年来中国人民创造汉语拼音字母的总结》一文，全面地总结了我国文字改革的历史，提出了推行这个方案的具体意见。其中对拉丁化新文字和国语罗马字的优缺点也作了分析：“如果说国语罗马字的缺点

是标示声调的办法过繁，那末拉丁化新文字的缺点就是过简，完全不标声调，”等等。总而言之，这次公布的方案，是60年来反复研究和实践的结果，是一个比较完善可行的方案。同年他出版了《文字改革论丛》，力图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说明汉字改革是与社会历史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最后他引用毛泽东同志说：“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的话为结。他说“一定条件”就是要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语言学中的问题，一无错，二无偏。⑥

经过几年研究工作。1962年以后，他与刘世儒合著的《汉语语法教材》，陆续出版。在这三大册书里，他修改了过去《新著国语文法》中不足之处，最后归纳出汉语词类划分的标准为“词汇、语法范畴”。根据这个标准，他将汉语词分为五类九品；说明词有定类、类有定词，二者独立存在，但又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可以发生转类、兼类、活用等等。是书为黎氏语法体系和教学体系全面的总结。

1958年2月《汉语拼音方案》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正式公布。从此汉字改革运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黎锦熙为之奋斗数十年的理想，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他感到无比兴奋。为了表达他对马列主义的衷心拥护，他用图解法分析了毛泽东同志所著的《实践论》，同年出版。

1962年春节前夕，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对台广播后，回到家里，心情很不平静。一天夜里梦见台湾解放了，他乘宇宙飞船遨游太空，甚为高兴。醒来时赋《沁园春》一阕为记，其词曰：“解放台湾，雾净波澄、风举叶飘。笑星沉海底，当窗历历，河源雨过，隔座滔滔。远掠层空，近探园日，银汉翱翔孰比高！从天降，又百花齐放，万种妖娆。地球映日呈娇，瞰海岸回环尽舞腰。叹向戍弭兵，徒劳唇舌；屈原爱国，空赋离骚。民主阵营，和平堡垒，谁在张弓学射雕？拭目看，被东风压倒，曾不

崇朝。”^⑦ 这首词反映了他怀念台湾故旧，要求祖国早日实现统一的愿望。

在十年浩劫中，黎锦熙虽受到党中央的关怀和保护，但也免不了受到一些冲击，他的书籍曾被查封起来，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使他精神上刺激很大。处此逆境，但他还是坚持工作，写了近三十种学术论著，其中突出的是1970年创制了《汉语双拼体系全表》。根据汉字特点，为了使文字快速走向机械化，于是改三拼为双拼，也就是用两个字母拼一个音节。1971年后，他改用这个双拼方案来写日记，以此总结经验，便于修改提高，使之更加完善。之前，从1922年开始，他是用注音符号写日记；1927年改用国语罗马字记；1958年后改用汉语拼音。其目的是想通过自己的实践，比较各种方案的优劣，来推进文字的改革，数十年如一日，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1972年黎锦熙已是82岁高龄的老人了，可是他还不不停地工作，写了《文字改革概说》面呈周恩来同志，向党中央汇报。当时周恩来同志很关心他，指示给他派助手，改善他的工作条件。1974年他又写了《七十年来文字改革运动的自我评介和今后希求》一文，总结过去工作，提出三点建议：①试验《汉语双拼字母“双拼”制草案》；②推广“注音汉字”排印的书刊课本；③采用教育革命的“新综合教学法”。最后他希望通过广大群众的科学实验和语文教学实践，观其成效，促其实现。

1978年1月，他向党中央负责同志提出在繁荣发展自然科学的同时尽快发展社会科学的建议，没有多久，他于3月27日与世长辞了。终年89岁。

黎锦熙一生兢兢业业，以“勤”、“恒”二字治学，研究的领域很广，除语言学外，文学史，近代语，哲学，佛学、乃至目录学，图书馆学皆有较深造诣。著作极富，论文三百余篇，专著三十余部。在学校任教七十余年，除在北师大外，还兼任北京大

学、燕京大学等校的教授。他把毕生精力献给我国文字改革的伟大事业，是一个有始有终的先驱者。他的治学经验很丰富，这里可用他给学生的一幅题词来归纳，他说：“不怕不宽宏，就怕太笼统；不怕不聪明，就怕不宽容；不怕不用功，就怕乱翻动；不怕不奋发，就怕如炮炸；不怕胆不大，就怕少规划。”⑧这虽是勉人之词，但其中包含着多年治学心得和体会，很值得后学的深思。

注释：

①黎锦熙：《为反对设“读怪科”及中学废·国语事上教育总长呈文》、《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89页。

②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200页，1934年，商务出版。

③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188页，1934年商务版。

④黎锦熙：《钱玄同先生纪念集》第十页。

⑤黎锦熙：《廿年纪事诗存》19页。（油印本芷黎宅）

⑥黎锦熙：《文字改革论丛》123页、127页。

⑦黎锦熙：《廿年纪事诗存》46页。（稿本芷于黎宅）

⑧梁容若：《黎锦熙先生与国语运动》，《抖擞》1979年9月（香港版）。